

序 一

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对我国史学界来说是一个“知之不多”的学科，也是一个研究难度比较大的领域。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个民族曾创造了最早的一神教（犹太教）文化，深刻地影响公元 1 世纪出现的基督教和公元 7 世纪产生的伊斯兰教文化。这个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历经苦难与波折，其状难以详述。今试勾勒其古代历史的简单轨迹：早在公元前 11 世纪之际，这个民族曾在今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统一的神权政治国家，存在约有八九十年的“黄金时期”，亦即大卫、所罗门的统一王国时期。之后，经历统一王国分裂的南北国时期、被掳巴比伦的囚虏时期、从波斯帝国的回归、重建耶路撒冷“第二圣殿”时期。在经历了希腊帝国统治近 300 年之后，进入公元第一个世纪的 70 年代，在强悍的罗马帝国铁蹄蹂躏下，这个民族（亦即犹太民族）的余民失去了这片属于自己的土地，进入向世界各地流散的悲惨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有 600 万犹太人死在纳粹的集中营中。

历史斗转星移，直到上个世纪 40 年代的 1948 年饱受苦难的遍布世界五大洲的犹太人，竟在流徙一千多年之后，在巴勒斯坦重建了现代的以色列国，并在 1991 年与我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近年来，随着中以两国的建交，两国经济、科技、文化各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历史上曾有相似被欺压的经历，中国人民解放自己并强大起来了，对于犹太民族遭受的苦难是身有同感的。

半个世纪以来，关于这个民族古老的历史研究在世界诸多史学界日益得到重视，而在我国的学术界，对这个古老民族从古至今的历

史过程的研究可以说是刚刚开始。

我很高兴看到南开大学王立新同志在其母校文学院繁忙的教学与行政岗位上，于今年 5 月份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这篇博士论文赢得了南开大学博士学位委员会的全票通过，评语为“这篇优秀的博士论文对于我国薄弱的古代以色列历史与文化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一致赞同授予王立新同志历史学博士学位。

我与王立新同志交往已逾十年，他一直在南开大学学习和工作，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都曾受教于著名希伯来文学专家朱维之教授。1994 年经朱老教授的特别推荐到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进修圣经希伯来语。1995 年至 1996 年在中以两国建交四年之后，他作为国家教委派赴以色列的第一批高校文科教师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人文学院继续深造，研究古希伯来文化与文学。当他还在希伯来大学学习期间，经他的多方联系，使我夫妇二人有机会在 1996 年夏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参加了一次国际性的、有多国圣经学者参与的关于《圣经》研究的学术讨论会。会后，我夫妇二人还访问了以色列、埃及、希腊、土耳其、约旦五国。回国之后，我将此次访谒基督教有关圣地的观感，写了《圣地五国行》一本小书，并附有当时随地拍摄的百余张圣地照片。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就有一张我夫妇两人与王立新和另外两位南开校友在希伯来大学校园高台上眺望东耶路撒冷旧城时的合影照片，忆当年情景犹历历在目。王立新同志在南开大学学习、研究以及其后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深造、潜心钻研的经历，积累了丰富的关于古代以色列史的资料，使他回国后在南开大学用五年多的时间，一边担负繁重的工作，一边不分昼夜地孜孜攻读博士学位，今年 5 月终于完成了上述选题的博士论文。这篇关于古代以色列史的优秀论文的出现绝不是轻省的，而是积淀了几年的精心研究，结出了理所当然非他莫属的突出成果。

本人上世纪 50 年代就读于原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师从赵紫宸博士、李荣芳博士攻读基督神学和圣经希伯来文。上个世纪 60 年代，

由北京转来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从事旧约圣经(即《塔纳赫》)与圣经希伯来语的教学工作。先后写下《希伯来民族简史》、《旧约导论》、《旧约原文词义》等书)对这个领域的许多基本资料,我是熟悉的。今日喜读王立新这篇博士论文关于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与历史观念三大部分有关论题时,深感作者从不盲从“权威”结论,而勇于提出个人独有的创见。

我曾经忝为王立新同志的老师,今日通读其博士论文,在诸多方面对我确有开阔眼界与顿开茅塞的作用。我企盼和期待王立新这篇博士论文的出版,将有助于改变我国对犹太文化与犹太古史研究还较薄弱的状况,并能对今后犹太民族史、犹太学的研究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许鼎新

2003年8月17日于南京

序二

以色列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冲突，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的一个焦点。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灾难。世人不禁对以色列国家的情况和犹太人的历史命运深感兴趣，想了解一个究竟。从另一方面说，基督教是以西方国家为重心传遍全球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界性宗教，其创教者耶稣是古代犹太人。基督教的经典《旧约圣经》原本是犹太人的宗教典籍，也即希伯来《圣经》（《塔纳赫》），其中不但提出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的论断，而且大量记载了古代以色列人的活动和历史，以及耶和華神与以色列人的律法约定。人们很自然要问：希伯来《圣经》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如何编成？其中所说的古代以色列人的事迹是否真实可靠？

19世纪以来 西方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民族学、古文字学都有巨大发展，学术界关于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文化及其典籍的研究不断取得重大突破。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对以色列加强了研究，犹太学得到建立和发展，出版了不少著作，但多偏重于近现代方面。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近 20 多年对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和印度的历史探讨都有专著问世，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佳作甚多，惟独对古代以色列的历史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优秀的作品不多，不能不令人颇有憾意。

王立新君素好文史，虽于大学时代人文学专业，但对历史研究未尝或忘。本科之后他在南开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专业为世界文学，得朱维之、臧传真、张镜潭等世界文学耆宿的亲炙，毕业后留校任教。

朱维之先生是国内世界文学的大家，尤精希伯来文学与文化，王君原本的治学重点是西方文学（这方面他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但上世纪90年代初朱先生退休前，为不使南开的这一特色研究传统中断，特意亲自安排当时风华正茂的王君到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进修圣经希伯来语，随后王君又远赴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深造。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王君深感古代历史与其研究领域的密切关系。为攀登史学高峰，他于1997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攻读在职博士研究生，在我的指导下专攻古代以色列史。不久，他晋升教授，并任文学院副院长，既主管全院教学事务和基地建设工作，更讲授数门课程，指导多名研究生，负担是比较重的。然以其才学勤奋，虽工作繁忙，四年之内自可完成合乎标准的博士论文。然而，他治学严谨、律己甚苛，多次向我表示，既然作史学博士研究生，所撰学位论文必以纯史学的学术标准为衡量尺度，遂自己提出延长毕业时间。乃夙夜匪懈、精益求精，历时五年半，终于完成这一博士论文，荣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其论文被历史学院评为优秀博士论文。

《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一书即是王立新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全书分上、中、下三编。第一编“古代以色列的历史文献与文本分析”，是首先通过对古代以色列人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塔纳赫》各卷文本的分析，对基本文字史料做扎实细致的梳理、考订和整理。第二编“古代以色列历史的基本框架”，则是根据各种史料——文字的、实物的、历代相传的、考古发现的——进而对古代以色列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结构做出系统的缕析和筑造。第三编“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观念”，乃是在整理好史料、完成历史本身框架搭建之后，经过探讨“历史书卷”的组合、《塔纳赫》正典化的过程和神权史观的内涵，来归纳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观念和史学传统。总起来说，本书的优点是：在比较详尽地吸取和总结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宗教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上述三编的三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富有创新性的见解，应该说，他的努力对我国史学界尚比较薄弱的以色列古

代史和史学观研究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先师雷海宗先生是学贯古今中外的史学大师，对犹太人的历史、基督教史和《圣经》都有精深研究，可惜由于各种条件和原因，过早著世，在这方面未能留下系统的专门著作。43年前，雷师曾将他收藏的两本关于犹太人历史和《圣经》研究的英文专著借我阅读，希望我能有所得，但他不久仙逝，我也转向从事其他领域的工作。17年后，我虽重理世界古代史旧业，但更多偏重古希腊罗马史，未能有机会对古代以色列史多做深入考察，引为憾事。雷师认为，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应为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统一，即，要做审查、鉴别与整理材料的科学分析工作；以一以贯之的概念和理论说明史实的哲学综合工作；用艺术的手段叙述历史的文学表现工作。我以为王立新君的这本书达到了上述三方面的要求，因而是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王立新君作为雷门再传弟子，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为此感到欣慰。

本书毕竟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篇幅有限，因此对古代以色列史只建构了基本的框架，不可能对具体史实做详细的论述；此外，对古代以色列的宗教与文化亦不可能专门探讨。我衷心希望王立新君能再接再厉，在本书的基础上更登一层楼，写出内容更翔实丰厚的关于古代以色列民族整个历史和文化的专著，以满足学界和读者的需要。

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长

王敦书

2004年2月25日

导 言

一个民族的现在，总是与其过去的历史相联系的。当今犹太民族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舞台上所扮演的活跃角色，使人们在了解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同时，日益将目光投向这个民族久远的历史，以期在对它的文化之根的考察中，寻觅对现实问题的解答。闻一多先生在比较中国、印度、希伯来和希腊四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发展史后曾经指出：“四个文化同时出发，三个文化都转了手，有的转给近亲，有的转给外人，主人自己却没落了。”^①作为诗人的闻一多，形象地说明了除中华文化之外的其它三种文化的历史命运。众所周知，在人类文明史上，古代以色列民族创造了最早的、完整的一神教文化，并深刻影响了公元 1 世纪出现的基督教和公元 7 世纪产生的伊斯兰教文化。这两个文明领域的历史传统告诉我们，发端

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见《闻一多代表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 第 317 页。

于古代西亚小小一隅的古犹太文化，与它们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对古代以色列民族历史的研究，在了解这个民族本身发展历程、文化观念的同时，也就超越了这一具体的范畴，具有了更加广泛的意义。

从我们的具体研究领域看，中外学术界的状况呈现出极度不平衡的状态。这并不难理解。犹太教与基督教的联系，使得西方学术界自古以来就有研究《圣经·旧约》的传统，这为对古代以色列历史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则一直珍视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一代一代地传承、发展着自己的精神文明。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在没有祖国的条件下，保持着民族的特色，在流散一千余年后，重新在故土上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在国际上，有关古代以色列民族文化的各种研究可以统称为“犹太学”，是与“埃及学”、“亚述学”或专事古希腊罗马研究的“古典学”相提并论的一个学科。在这方面，涌现出众多的学术成果。纵观几个世纪以来的研究进程，可以发现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无论是在西方学术界还是在犹太学术界，历来就存在着从宗教神学还是从客观、实证的立场上进行研究的两种不同的路径。前者依据的是宗教的权威传统，后者依据的则是对文献的分析、考证和不断发现的大量旁证史料。客观地说，在整个西方，只是到了 18 世纪，随着启蒙运动的到来，真正具有科学和实证精神，逐步摆脱了宗教神学影响的研究才开始展开。第二，犹太学者的研究自 19 世纪以来逐步兴起。在 19 世纪前的一千多年里，犹太人世界性大流散的命运、各地犹太人社团的生活方式，使得真正的学术研究难以开展。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著名的犹太解经家和思考现实问题的犹太思想家代不乏人，但却鲜见有重要影响的犹太历史学家。19 世纪末，特别是 20 世纪以来，随着犹太民族生存状况的改变和犹太人问题在国际舞台上日益突出的地位，这种情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在现代以色列国，该领域的犹太学者都大量涌现。包括古代以色列民族史在内的“犹太学”在国际学术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一个

学科的繁荣既说明了它的研究价值，也说明了它存在着宽广的研究空间。的确，这个领域中的诸多问题都是聚讼纷纭，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探讨。

犹太人较早就与我国发生了联系，虽然具体时间仍有争议，但一般认为始于宋代。中国关于犹太人与犹太文化的记载据考最早见诸《元史》。1897年，洪钧在《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九《元史各教名考》中，对存在于中国的犹太教作了考证。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有关记述，多以中国开封犹太人及其“一赐乐业教”^①为对象并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中兼及犹太人问题，著名的如陈垣先生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②、张星娘先生的《古代中国与犹太之交通》^③等。与本文相关的外文翻译著作则见到都孟高著、黄叶秋译的《希伯来民族史》^④，但属于依据基督教观点的介绍，过于简略。

1949至1992年中以建交前，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不很多，专著以潘光旦先生的力作《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问题——开封的犹太人》^⑤、江文汉先生的《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⑥为代表，重要论文则有王神荫先生的《死海古卷与库姆兰社团》^⑦、高望之先生的《中国历史上的犹太教和犹太人》^⑧和《论犹太

① “一赐乐业”即“以色列”(Israel)的音译。

《东方杂志》1920年第5期、第7期，后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

《辅仁大学丛书》第4册第21—40页，1930年。后收入多卷本《中西交通史料汇编》5，中华书局，1977—1979年。

圣公会出版，1931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⑥ 知识出版社，1982年。

⑦ 《世界宗教》1980年第2期。

⑧ 见《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

教和希伯来民族的同步生成》^①，彭小瑜先生的《略论犹太教一神论的起源和发展》^②等。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尽管涉及很多的方面（如犹太教、中东问题、圣经文学），但研究重心仍是放在开封犹太人问题上。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中国的犹太文化研究逐渐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一批新一代学者开始涌现，大型工具书及较多的专著、译著和论文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小高潮的到来。如徐新、凌继尧主编的《犹太百科全书》、顾晓鸣主编的《犹太文化丛书》、傅有德主编翻译的《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等，都引起了重要的反响。这些著作中专涉古代以色列历史研究的主要有顾晓鸣著《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王仲义编著《犹太教史话》，许鼎新著《希伯来民族简史》、《旧约导论》，朱维之主编《希伯来文化》，朱维之与韩可胜合著《古犹太文化史》，以色列阿巴·埃班著、阎瑞松译《犹太史》，黎巴嫩萨比尔·塔伊迈著、张文建与王复翻译的《犹太通史》等，论文主要有唐裕生《形成于早期社会里的犹太民族特殊性》，金应忠《古以色列君主国覆灭新探》，龚方震《希伯来圣经源流与死海古卷》，拙文《论以色列君主制发展的三个阶段》，笔者与王敦书先生合著的《试论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观：从资料构成、史书编集到观念的形成》等。这些成果发表于各种刊物，印行于多家出版机构，在此不一一注明。

从总的研究状况看，国内专事犹太学研究的学者偏少，而从历史科学的角度，在考证使用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的以色列古代历史的研究则更不多见。在翻译过来的著作中，大多是通史、通论性著作，且多涉及犹太人流散后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古代以色列历史的深入探讨还有待于我们展开。

本文的研究实际上涉及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历史文献的考察、以色列民族起源到第二圣殿初期的历史框架的讨论和笔者对古代以

①《世界宗教研究》1984 年第 4 期。

②同上。

色列民族历史观的思考。按照笔者的理解，这三个方面构成了逻辑上的递进关系。

还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希伯来《圣经》（《塔纳赫》）的内容与基督教新教的《旧约》是一致的（但各卷排列顺序不一致），本文在引证经文时以中国基督教会承认的官话和合中译本《圣经》为据，但在某些具体章节、语汇或词汇上，则依据《标准犹太圣经》（按马所拉传统加注元音符号的希伯来文《塔纳赫》）进行了考释。本文在注释经文出处时，对各卷文献的名称采用了通用的缩写形式，特附录于下：

《创世记》（创）	《出埃及记》（出）
《利未记》（利）	《民数记》（民）
《申命记》（申）	
《约书亚记》（书）	《士师记》（士）
《撒母耳记·上》（撒上）	《撒母耳记·下》（撒下）
《列王纪·上》（王上）	《列王纪·下》（王下）
《以赛亚书》（赛）	《耶利米书》（耶）
《以西结书》（结）	《何西阿书》（何）
《约珥书》（珥）	《阿摩司书》（摩）
《俄巴底亚书》（俄）	《约拿书》（拿）
《弥迦书》（弥）	《那鸿书》（鸿）
《哈巴谷书》（哈）	《西番亚书》（番）
《哈该书》（该）	《撒迦利亚书》（亚）
《玛拉基书》（玛）	
《诗篇》（诗）	《箴言》（箴）
《约伯记》（伯）	《雅歌》（歌）
《路得记》（得）	《耶利米哀歌》（哀）

《传道书》(传)

《但以理书》(但)

《尼西米记》(尼)

《历代志·下》(代下)

《以斯帖记》(斯)

《以斯拉记》(拉)

《历代志·上》(代上)

上 编

古代以色列的 历史文献与文本分析

第一章

《塔纳赫》的构成及其与基督教 《旧约》的关系

探讨与古代以色列民族历史发展有关的问题，首先面对的困难就是基本史料的匮乏。在我们所考察的范围内，能够依据的基本文字资料，最重要的是以色列民族的文化经典《塔纳赫》(Tanach)，也即希伯来《圣经》。其后出现的、零散提及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作品，主要有公元 1 世纪犹太史学家约瑟福斯的《犹太古事记》^①，以及后来犹太拉比们编订的《塔木德》^②。然而，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些后人

^① 约瑟福斯·弗拉维乌斯 (Josephus Flavius 约公元 38—100)，犹太史学家。主要著作除文中所提的 20 卷《犹太古事记》外尚有 7 卷《犹太战争史》和 2 卷《驳阿皮翁》传世。

^② 《塔木德》(Talmud，意为“学习”)的编纂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公元 200—210 年，在乌沙犹太教公会首领、犹太亲王犹太拉比 (Rabbi Judah) 的支持下犹太教会将 100 余位著名拉比的 13 部阐述律法的法规文集编辑成一部《密西拿》(Mishna，意为“口传的教诲”)，用以指导犹太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做才是符合《妥拉》精神的。公元 3 世纪后，为适应新的社会发展所提出的要求，拉比们又补编了律法释义汇编《哥马拉》(Gemara，意为“完成”)主要以《妥拉》为据对《密西拿》进行阐释。两部分合称《塔木德》。这部约在公元 375 年在古代以色列地完成的巨著在犹太教史上被称为“《耶路撒冷塔木德》(Talmud Yirushalmi 或 Talmud eretz Israel) 或者“《巴勒斯坦塔木德》”。此后，巴比伦尼亚犹太社区的拉比们为适应新的情况继续进行增订和补编，约在公元 500 年完成了规模更为宏大的《巴比伦塔木德》(Talmud Bavli)。《塔木德》是犹太人口传律法的总集和仅次于《塔纳赫》的第二经典，反映了巴勒斯坦和巴比伦尼亚地区犹太人数世纪来的宗教、伦理、经济、政治、学术研究等各方面的状况。对犹太人来说，《塔木德》就是日常生活的准则和道德伦理的规范。